

山东大学文史书系

东晋文艺综合研究

张可礼 著



山东大学出版社

山东大学文史书系

（CIP）数据在案

东晋文艺综合研究



张可礼 著



山东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东晋文艺综合研究/张可礼著. —2版. —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 2009. 4

ISBN 978-7-5607-2213-9

I. 东…

II. 张…

III. ①古典文学-文学评论-中国-东晋时代

②艺术评论-中国-东晋时代

IV. I206. 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86723 号

山东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山东省济南市山大南路 27 号 邮政编码:250100)

山东省新华书店经销

山东新华印刷厂印刷

720×1000 毫米 1/16 18.5 印张 301 千字

2009 年 4 月第 2 版 2009 年 4 月第 4 次印刷

定价:37.00 元

版权所有,盗印必究!

凡购本书,如有缺页、倒页、脱页,由本社发行部负责调换

本书为中国社会科学基金项目
获得山东大学出版基金、山东大学“211 工程”的资助

目 录

第一章 东晋：一个文艺繁荣的朝代	(1)
一、高质量的多数量	(1)
二、多元共荣·创新·主观内容的增强	(11)
三、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	(19)
第二章 东晋文艺发展的历程	(48)
一、第一阶段：东晋前期	(48)
二、第二阶段：东晋中期	(59)
三、第三阶段：东晋后期	(82)
四、几点启示	(106)
第三章 门阀士族与东晋文艺	(109)
一、四大门阀士族文艺世家	(109)
二、门阀士族文艺世家的个性和共性	(161)
三、门阀士族文艺世家形成的主要原因	(165)
四、门阀士族对东晋文艺的积极影响和消极作用	(177)
第四章 东晋多种文艺的相互通融	(185)
一、艺术积累和社会条件	(185)

二、文人多兼善数艺	(190)
三、文学与书法	(193)
四、文学与绘画	(195)
五、书法与绘画	(203)
六、通融与区别	(206)
第五章 东晋文艺在当时的传播和效应	(215)
一、两种主要传播类型	(215)
二、对传播范围的推测	(224)
三、传播效应	(232)
附 录	(240)
自由·自然·和谐——陶渊明诗文内容三要义	(240)
陶渊明的文艺思想	(260)
主要参考书目	(277)
后 记	(286)

第一章 东晋：一个文艺繁荣的朝代

东晋从晋元帝司马睿建武元年(317)开始建立,到晋恭帝司马德文元熙二年(420)为刘宋所取代,前后共 104 年。东晋的文艺在这一百多年里,人才辈出,佳作如林。王羲之、王献之父子的书法,顾恺之的绘画,戴逵、戴颙父子的雕塑,郭璞的《游仙诗》,孙绰、许询等人的玄言诗,陶渊明的田园诗等,超越以前,彪炳后世,不论在我国古代文艺史上,还是在世界文艺史上,都是光彩夺目的一页。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东晋是一个文艺非常繁荣的朝代。东晋一朝,文艺占据了整个文化的中心。

一、高质量的多数量

东晋文艺的繁荣,主要表现是,这一时期文艺作品的数量多、质量高。

稽查现存有关东晋的多种资料,可以发现东晋著名文人的作品的数量是相当可观的。这里仅举在东晋文艺领域里占有重要地位的书法和集部作品作为例证。

东晋时期,著名的书法家人数众多。为了证实这一问题,我们可以把南朝宋代的书法家羊欣在《采古来能书人名》一文中提供的资料作为重要的参照^①。《采古来能书人名》可以视为现存我国最早的书法简史。文中收秦朝至东晋末年

^① 参阅羊欣《采古来能书人名》,见《法书要录》卷一,张彦远辑,洪丕谟点校,上海书画出版社 1986 年 8 月第 1 版(下引此书,版本均同)。

640 多年的著名书法家 72 人^①。其中属于东晋的,按原文的先后顺序有羊忱、羊固、李式、李定、李公府、卫夫人、王廙、王导、王恬、王洽、王珉、王羲之、王献之、王玄之、王徽之、王淳之、王允之、王濛、王修、王绥、郗愔、郗超、庾亮、庾翼、谢安、许静民、张翼、谢敷和康昕,共 29 人,占所收总数的 40%。这个比数是相当高的。谈到东晋书法家的人数,还有一个现象特别值得我们关注,就是东晋女书法家的人数也相当多。据陶宗仪《书史会要》记载^②,东晋的女书法家有卫夫人、庾亮妻荀夫人、王羲之妻郗夫人、郗愔妻傅夫人、王洽妻荀夫人、谢道韞、王献之女仁爱、王珉妻、羊衡母蔡夫人和豫章女巫,共 10 人。而秦汉、三国、西晋和南北朝共 700 多年的女书法家,只有汉代的马夫人、蔡琰,曹魏的文昭皇后,西晋的武元皇后和陈朝的后主皇后,共 5 人。两相比较,可以明显地看到东晋女书法家人数之多。这表明东晋的书法艺术已经为更多的女性所热爱、所接受。我国古代,大概从母系制到父权制开始,在漫长的岁月里,男子居于统治地位,女性一直处于被压抑的处境。这种处境决定了她们的沉默。她们没有自己的历史,很少有自己的文学艺术,文学艺术被男性控制着。书法艺术更是这样。同男性相比,我国古代的女性接触书法艺术的有利条件更少,所以在不少朝代,女书法家往往是凤毛麟角,但东晋却出现了那么多的女书法家,而且有不少人成就卓著。这是东晋书法艺术繁荣的一种表现。

我国古代书法作品的数量,随着时间的推移,亡佚的相当多。基本的情况是,时间越早,亡佚得越多。拿东晋和宋、齐、梁、陈四朝相比,东晋亡佚得更多。张怀瓘《二王书录》云^③:

古之名书,历代帝王莫不珍贵。齐、宋以前,大多散失。

即使如张怀瓘所言,东晋流传下来的书法作品的数量还是相当多的。为了证明这一点,我们可以把《淳化阁帖》^④提供的资料作为重要的参照。在我国古代书法艺术史上,《淳化阁帖》是较早的、也是著名的丛帖。它是北宋淳化三年(992),宋太宗赵炅命侍书学士王著选择内府所藏的历代书法摹刻而成的。《淳

① 原注:“凡六十九人。”不确。

② 陶宗仪:《书史会要》,上海书店 1984 年 11 月第 1 版。

③ 张怀瓘:《二王书录》,载《法书要录》卷四。原题为《二王等书录》,《墨池编》卷四、《全唐文》卷四三二均题为《二王书录》。从内容看,当从《墨池编》和《全唐文》。

④ 《淳化阁帖》,上海书店 1984 年 11 月第 1 版(下引此书,版本均同)。

化阁帖》所收多是历代书法的精品。其中收东晋书法家 39 人，书法作品 289 件。我们把这一数量同该书所收南朝宋、齐、梁、陈四朝书法的数量加以比较，可以看到，东晋书法作品的数量是非常多的。宋、齐、梁、陈四朝前后共 169 年，《淳化阁帖》收四朝书法家 18 人，书法作品 20 件。四朝的时间长于东晋，又在东晋以后，但所收东晋的书法家为四朝的 2.17 倍，书法作品为四朝的 14.45 倍。《淳化阁帖》选收了这么多的东晋书法家和书法作品，而且远远地超过了南朝四朝，这从一个方面证明了东晋书法艺术的繁荣。

东晋文人集部作品的数量，我们可以根据《隋书·经籍志四》^①的著录了解其大概。《经籍志四》著录东晋文人集部作品共 106 种^②，平均每年 1.03 种；著录南朝宋、齐、梁、陈四朝共 178 种，平均每年 1.05 种。集部作品同其他历史文献资料一样，其存留的数量往往与时代有关。一般的情况是，由于动乱的毁坏和文人对文集的态度的变化，时间愈久远，流传下来的文献资料愈稀少^③。东晋的集部作品到唐朝显庆元年（656）长孙无忌写成《隋书·经籍志》时，散失的当会多于南朝。即使这样，东晋集部作品的数量到唐代还同南朝四朝大体相当。由此可以推想，东晋文人的集部作品的数量是相当多的。饶宗颐指出：“魏晋南北朝文学的最大发展，是‘集部’的形成和推进。”^④关于以集名书者，《四库全书总目》卷一四八云：

集部之目，《楚辞》最古。别集次之，总集次之。诗文评又晚出。词曲则其闰余也。古人不以文章名，故秦以前书无称屈原、宋玉工赋者。洎乎汉代，始有词人。迹其著作，率由追录……至于六朝，始有编次。

① 《隋书》，中华书局 1973 年 8 月第 1 版（下引此书，版本均同）。

② 《隋书·经籍志》把《陶潜集》列于宋代。鉴于陶潜主要生活在东晋，故上面的统计把陶潜由宋代移至东晋。

③ 汪国垣《汉魏六朝目录考略》云：“《晋中经簿》一千百十九家，仅七百六十家存，亡三分之一。至宋以后书，不记亡数。盖世近大概存也。”引自袁咏秋、曾季光主编《中国历代图书著录文选》，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5 年 10 月第 1 版，第 483 页。《四库全书总目》（永瑢等撰，中华书局 1965 年 6 月第 1 版）卷一百四十八《别集类一》：“集始于东汉。荀况诸集，后人追题也。其自制名者，则始张融《玉海集》。其区分部帙，则江淹有《前集》，有《后集》；梁武帝有《诗赋集》，有《文集》，有《别集》；梁元帝有《集》，有《小集》；谢朓有《集》，有《逸集》。与王筠之一官一集，沈约之《正集》百卷，又别选《集略》三十卷（礼按：《隋书·经籍志四》作二十卷，未著姓名）者，其体例均始于齐梁。盖集之盛，自是始也。唐宋以后，名目益繁。然隋唐《志》所著录，《宋志》十不存一。《宋志》所著录，今又十不存一。”

④ 饶宗颐：《从对立角度谈魏晋南北朝文学发展的路向》，见《魏晋南北朝文学论集》，文史哲出版社 1994 年 11 月第 1 版，第 1 页。

《隋书·经籍志四》云：

别集之名，盖汉东京之所创也。自灵均已降，属文之士众矣，然其志尚不同，风流殊别。后之君子，欲观其体势，而见其心灵，故别聚焉，名之为集。辞人景慕，并自记载，以成书部。年代迁徙，亦颇遗散。其高唱绝俗者，略皆具存。

据上述记载，别集之名，当始于东汉。但从今存的文献来看，梁阮孝绪编撰《七录》，才正式名文集。梁之前的文集多是后人编次的。各种文集的作者都是“属文之士”，文集的内容虽然复杂，但“高唱绝俗”的以诗赋为代表的文学作品是主体。东晋有这么多文集传世，从一个方面显示了东晋文学的繁荣。

东晋文学的繁荣，我们还可以从《世说新语·文学第四》提供的资料得到印证^①。《文学第四》共一百零四条，其中第一至第六十五条记载的是汉末魏晋的名士有关学术的言行。自六十六条至一百零四条，共三十九条，记载的是魏晋文人涉及文学的活动^②。三十九条中，属于曹魏时期的有三条，属于西晋时期的有六条，属于东晋的有三十条。《世说新语》所记的内容，虽有厚近薄远的倾向，但所记东晋关于文学的言行为曹魏和西晋总和的三倍还多，这恐怕不仅仅是厚近薄远的原因，而是与东晋文学的繁荣有关。

上面列举的有关书法和集部作品的数字等现象，从数量上体现了东晋文艺的繁荣。但一个文艺繁荣的时代，主要不是体现在作品的数量上，更重要的是质量。因为文艺的繁荣，主要不是作品数量的添加，而是在数量较多的作品中，有一批是高质量的。只有高质量的作品，才会有生命，才会有持久的艺术魅力。东晋的文艺正是这样。东晋文艺的各个门类中，特别是书法、文学、绘画和雕塑等艺术，都有许多第一流的精品。正是这些第一流的精品，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东晋文艺的繁荣。近人马宗霍《书林藻鉴》^③卷六说：

书以晋人为最工，亦以晋人为最盛。晋之书，亦犹唐之诗、宋之词、元之曲，皆所谓一代之尚也。

马氏所说的“晋人”，指的主要是东晋的文人。晋代的书法之所以能够同唐诗、宋

① 据《世说新语笺疏》，余嘉锡撰，中华书局1983年8月第1版（下引此书，版本均同）。

② 这里所谓的“文学”是广义的，其中包括历史。

③ 马宗霍：《书林藻鉴》，文物出版社1984年5月第1版。

词和元曲相提并论，成为一代风尚的艺术，主要是由于东晋以王羲之和王献之父子为代表的书法家，创作了许多被历代人们所珍重的优秀作品。王羲之的书法，“总百家之工，极众体之妙”，特别是他的楷书^①、行书和草书，优秀作品更多。唐朝张彦远《法书要录》卷十收王羲之帖目 465 种，其中有楷书、行书和草书。王羲之楷书的代表作是《乐毅论》、《黄庭经》和《东方朔画赞》。梁朝陶弘景在《论书启》中把《黄庭经》和《乐毅论》视为王羲之书法的“名迹”，而《黄庭经》又是第一。王羲之行书的代表作是《兰亭序》。《兰亭序》被历代许多人誉为“天下第一行书”。明朝董其昌《画禅堂随笔》说：

右军《兰亭序》章法为古今第一，其字皆映带而生，或大或小，随手所如，皆入法则，所以为神品也。

其他如《快雪时晴帖》、《平安帖》、《丧乱帖》、《孔侍中帖》、《频有哀祸帖》等，都是流传千古的行书佳作。王羲之在草书方面，也创作了诸如《初月帖》、《行穰帖》、《远宦帖》和《十七帖》等优秀作品。这些作品“道媚劲健，绝代更无”^②。正是诸如上述优秀作品的创作，确立了王羲之在我国古代书法史上“书圣”的地位。

王献之的书法，也是兼善众体。他的行楷《廿九日帖》和《鸭头帖》，一笔书《中秋帖》和《十二月帖》，其他如《辞中令帖》、《鹅群帖》、《地黄汤帖》、《兰草帖》和《授衣帖》等，在书法史上都是为历代人们所称颂的上乘之作。

东晋的文学，也有不少高质量的作品。在这方面，首先值得我们称道的是郭璞和陶渊明。郭璞的诗赋都有一些名作，特别是他的《游仙诗》，不论是思想内容，还是艺术表现，都超越了以前的游仙诗，取得了很高的成就。清人陈沆说：“景纯《游仙》，振响两晋。”^③《昭明文选》选录游仙诗共八首，其中七首是郭璞的。这些可以证明郭璞《游仙诗》水平之高。陶渊明的作品，用质朴的语言、白描的手

① 晋时所谓的楷书，也称“今隶”、“正书”、“真书”。《晋书·王羲之传》：王羲之“尤善隶书”。这里所说的“隶书”指今隶，与汉代的古隶不同。《宣和书谱》卷三《正书叙论》：“字法之变，至隶极矣，然犹有古焉，至楷书则无古矣。在汉建初有王次仲者，始以隶字作楷法。所谓楷法者，今之正书是也。”陶宗仪《论隶书》云：“建初中以隶书为楷法，本一书而二名。钟、王变体，始有古隶、今隶之分，则楷、隶别为二书。夫以古法为隶、今法为楷可也。”（引自王原祁等纂辑《佩文斋书画谱》卷二，中国书店 1984 年 9 月第 1 版）张绅《论真书》云：“古无真书之称，后人谓之正书、楷书者，盖即隶书也。但自钟繇之后，二王变体，世人谓之真书。执笔之际，不知即是隶法。”（引书同上）

② 赵构：《思陵翰墨志》引唐何延年语，《四库全书》本。

③ 陈沆：《诗比兴笺》卷二，中华书局 1959 年 1 月第 1 版。

法,通过叙写自己出仕和归田以及在田园生活中的种种体验,表现了晋宋之际一个心地高洁的知识分子对官场、对虚伪欺诈的世俗社会的鄙弃,表现了对自由的、自然的、和谐的人生的追求。他的作品有醇厚的诗意,也有深邃的哲理,能把诗意、形象和哲理融为一体。在我国古代文学史上,陶渊明的创作是继屈原之后的又一个高峰。王国维《文学小言》云:“屈子之后,文学上之雄者,渊明其尤也。”^①

论及东晋的文学,不少人常常诟病的是玄言诗。对东晋的玄言诗,从南朝的檀道鸾开始,历代有许多文人都是程度不同地予以否定。《世说新语·文学第四》第八十五条注引檀道鸾《续晋阳秋》曰:

正始中,王弼、何晏好《庄》、《老》玄胜之谈,而世遂贵焉。至江左李充尤盛。故郭璞五言始会合道家之言而韵之。询及太原孙绰转相祖尚,又加以三世之辞,而《诗》、《骚》之体尽矣。

沈约《宋书·谢灵运传论》曰:

有晋中兴,玄风独振,为学穷于柱下,博物止乎七篇,驰骋文辞,义单乎此。自建武暨乎义熙,历载将百,虽缀响联辞,波属云委,莫不寄言上德,托意玄珠,遁丽之辞,无闻焉尔。^②

刘勰《文心雕龙·时序》曰:

自中朝贵玄,江左称盛,因谈余气,流成文体。是以世极选遭,而辞意夷泰,诗必柱下之旨归,赋乃漆园之义疏。^③

钟嵘《诗品序》曰:

永嘉时,贵黄、老,稍尚虚谈。于时篇什,理过其辞,淡乎寡味。爰及江表,微波尚传。孙绰、许询、桓、庾诸公诗,皆平典似《道德论》。建安风力尽矣。^④

上引檀道鸾和沈约等人对东晋玄言诗的看法,虽然不尽一致,但有一点是相同

① 《王国维文集》第1卷,姚淦铭、王燕编,中国文史出版社1997年5月第1版(下引此书,版本均同),第27页。

② 《宋书》,中华书局1974年10月第1版(下引此书,版本均同)。

③ 参阅詹锳《文心雕龙义证》,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8月第1版(下引此书,版本均同),第1710页。

④ 参阅曹旭《诗品集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10月第1版(下引此书,版本均同),第24页。

的，就是基本上都持否定的态度。其实，檀道鸾等人的观点是相当偏颇的。今天我们评价东晋的玄言诗，不必囿于檀道鸾等人的见解，而应当实事求是地重新加以分析。对东晋的玄言诗，至少有以下几点值得我们注意：

第一，谈玄明道是当时许多文人的一种审美心态的流露，是他们襟怀的表现。《世说新语·赏誉第八》第一四四条载：

许掾尝诣简文，尔夜风恬月朗，乃共作曲室中语。襟怀之咏，偏是许之所长。辞寄清婉，有逾平日。简文虽契素，此遇尤相咨嗟。不觉造膝，共叉手语，达于将旦。

许掾指的是许询，他和简文帝司马昱都长于玄谈。许询又是当时玄言诗坛上执牛耳的人物。上面引文中所谓的“襟怀之咏”，意思当是借玄谈来抒发胸怀，彼此得到愉悦。这一点，南北朝时期有的文人看得很清楚。颜之推在《颜氏家训·勉学》中就指出：“清谈雅论，剖玄析微，宾主往复”，是为了“娱心悦耳”。^① 玄言诗实际上是玄言诗人的“襟怀之咏”，是玄言诗人审美心态的重要表现。玄言诗人常常把写作玄言诗作为一种“任乐”的方式。《世说新语·容止第十四》第二十四条云：

庾太尉在武昌，秋夜气佳景清，使吏殷浩、王胡之之徒登南楼理咏。音调始道，闻函道中有屐声甚厉，定是庾公。俄而率左右十许人步来，诸贤欲起避之。公徐云：“诸君少住，老子于此处兴复不浅！”因便据胡床，与诸人咏谑，竟坐甚得任乐。

殷浩、王胡之和庾亮都是当时热衷于玄谈的名流。他们在“气佳景清”的秋夜，登上南楼，“理咏”唱和，不只他们，而且其他的参与者，都为之放怀，得到了快乐。这里所谓的“理咏”，指的应是吟咏玄言诗。他们的玄谈和“理咏”大多是非功利的，表现了一种审美的意味。这一点，孙绰在为玄谈名士王濛所作的诔文中有所透露：

余与夫子，交非势利。心犹澄水，同此玄味。^②

孙绰把“玄”同“味”联及，说明玄谈不完全是抽象地辨名析理，而是含有审美的

① 参阅王利器《颜氏家训集解》（增订本），中华书局1993年12月第1版。

② 刘义庆：《世说新语·轻诋第二十六》第二十二條，思贤讲舍刻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11月第1版（下引此书，版本均同）。

意味。

粗略地看,东晋的玄言诗多理寡情,其实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后人的见解,当时的情况并非全是如此。在理与情这两方面,东晋有些玄言诗人往往表现出重理轻情,甚至时有主张以理去情的偏向。孙绰《答许询诗》九章其一说:

智以利昏,识由情屈。

其八又说:

愠在有身,乐在忘生。余则异矣,无往不平。理苟皆是,何累于情。

不过像孙绰这样重理轻情,只是问题的一方面。另一方面,东晋的玄言诗人并不是、也不可能完全否定情,他们当中的许多人是很有感情的,也是很重感情的。许询的“高情”,为世所重^①,特别受到了简文帝和孙绰的首肯。简文帝说,许询“才情,故未易多有所”^②。《世说新语·品藻第九》第五十四条载:当支遁问孙绰同许询相比如何时,孙绰回答说:“高情远致,弟子蚤已服膺。”孙绰虽然承认在“高情远致”方面,自己不如许询,但实际上,他也是相当重感情的。他曾赞许卫君长“神情都不关山水,而能作文”^③。当他谈及名士刘惔死亡一事时,痛哭流涕,因讽咏曰:“人之云亡,邦国殄瘁。”为此,还遭到了褚裒的斥责。^④看来东晋以许询和孙绰为代表的玄言诗人,都是有感情的。这一点同其他文人并没有什么不同。不同的是,他们注意寻理释情,以免为情所累,故他们的感情有时显得比较“高”、“远”。他们写的玄言诗表现的也多是这种“高”、“远”的感情。这种“高”、“远”的感情,在后人看来不合乎人们的普通的感情,但在当时的文人当中却是一种真实的感情,而且具有普泛性。

第二,从今存东晋的玄言诗来看,其中虽然有一些“淡乎寡味”之作,但也有不少蕴涵意味的作品,如王羲之、谢万各自创作的《兰亭诗》。王羲之诗云:

三春启群品,寄畅在所因。仰望碧天际,俯瞰绿水滨。寥朗无崖观,寓目理自陈。大矣造化功,万殊莫不均。群籁虽参差,适我无非新。

谢万诗云:

肆眺崇阿,寓目高林。青萝翳岫,修竹冠岑。谷流清响,条鼓鸣音。玄

① 参阅刘义庆《世说新语·品藻第九》第五十四条。

② 刘义庆:《世说新语·赏誉第八》第一四四条。

③ 刘义庆:《世说新语·赏誉第八》第一〇七条。

④ 参阅刘义庆《世说新语·轻诋第二十六》第九条。

崿吐润，霏雾成阴。

又如孙绰《秋日诗》云：

萧瑟中秋月，飏戾风云高。山居感时变，远客兴长谣。疏林积凉风，虚岫结凝霄。湛露洒庭林，密叶辞荣条。抚菌悲先落，攀松羨后凋。垂纶在林野，交情远市朝。澹然古怀心，濠上岂伊遥。

这些诗或侧重于景物描写，或把写景、抒情和悟理融为一体，从不同方面表现了当时许多文人在自然和玄理中追求“逍遥”、“散怀”的恬淡心态。即使一些重在阐发玄理的篇章和诗句，如王羲之《答许询诗》中的“争先非吾事，静照在忘求”，李充《送许从诗》中的“离合理之常，聚散安足惊”等，也能化老庄思想之旨意，蕴涵哲理，耐人寻味。

第三，在语言方面，有些玄言诗比较重视辞采。刘勰《文心雕龙·明诗》说，袁宏和孙绰等人的玄言诗“各有雕采”。《时序》论简文帝的玄言诗又说：“澹思浓采，时洒文囿。”刘勰所说的“雕采”和“浓采”，意思相近，指的都是袁宏和孙绰等人的玄言诗具有文采。

第四，诗歌的发展是一个连续的、辩证的过程。一种诗歌的产生和发展，有新的、同过去诗歌不相容的一面，同时也有承前启后的一面。从我国古代诗歌发展的历程来看，玄言诗是一个不可缺少的环节。东晋的玄言诗把玄理纳入诗歌，尽管产生了一些寡情之作，但它“历载将百”，盛行诗坛，从创作实践上，突破了先前长期居于统治地位的以政治伦理教化为主的诗歌理论和创作实际，也突破了先前人们所推崇的悲慨之音和穷苦之作以及哀怨感伤的基调，拓展了诗歌的领域，同时也是后来在更高层次上的哲理和情感相融合的诗歌的先导。此外，玄言诗对自然山水的描写和对辞采的重视，对后来田园诗的创作、山水诗的兴盛以及“俚采百字之偶，争价一句之奇；情必极貌以写物，辞必穷力而追新”的诗风的形成，有不可忽视的作用。没有玄言诗的盛行，很难设想会有后来陶渊明的田园诗和谢灵运的山水诗。基于上述理由，可以认为，被历代一些人所基本否定的玄言诗，实际上是东晋文学繁荣的一种表现。

东晋在绘画艺术方面，也有许多优秀的作品。这从唐代张彦远《历代名画

记》^①提供的资料可以得到印证。《历代名画记》是我国古代绘画论著中的重要著作。近人余绍宋认为它是“画史之祖”，“画史中最良之书”^②。《历代名画记》中的史传部分，搜集了自传说时代至晚唐会昌元年(841)众多画家的事迹和绘画画目，排列是以朝代为序。唐前部分主要是依据流传来的作品和文字记录。和唐以后的绘画著作相比，张彦远离东晋较近，他本人又是著名的收藏家，他搜集的资料，应当说可靠性很大。他评论古代的画家和作品比较公允。据初步考证，《历代名画记》卷五收录东晋画家十三人^③。他们是王廙、温峤、司马绍、王羲之、王献之、康昕、顾恺之、王濛、江思远、史道硕、戴逵、戴勃和戴颙。十三人中，被定为上品的有三人，他们是王廙、顾恺之和史道硕，占上品六人中的50%。在上品六人中，被定为上品上的有三人，其中东晋有二人，他们是王廙和顾恺之，占上品上总数的67%。从上面的数字不难发现，东晋绘画作品的质量，起码在隋代以前是首屈一指的。

在东晋众多著名的画家中，成就最突出的是顾恺之。《历代名画记》卷五录顾恺之画目多达40种，其数量在隋代以前的画家中，仅次于宋代的陆探微。顾恺之绘画的题材非常丰富，并且有新的突破。在他的绘画中，有关魏晋名士和山水的内容所占的比重相当大。他的壁画维摩诘在当时和后来都被视为珍宝。他画人物特别重视“点睛”，认为眼睛能够“传神写照”^④。他著有《论画》、《魏晋胜流画赞》和《画云台山记》等画论，其中强调“以形写神”和“妙想迁得”的论点尤为重要。^⑤ 顾恺之的绘画和绘画理论，在我国古代绘画史上具有划时代的地位。

与绘画相近的雕塑，在东晋也有不少为历代人们所嘉许的成功之作。著名

① 参阅张彦远《历代名画记》，秦仲文、黄苗子点校，人民美术出版社1963年5月第1版（下引此书，版本均同）。

② 引自张彦远《历代名画记·历代名画记简介》。

③ 《历代名画记》原收东晋画家十四人，其中有谢稚，并云：“（稚）初为晋司徒主簿。”谢稚实为宋人，应列入宋代。《南史·谢裕传》附其孙《谢孺子传》：“孺子，少与族兄庄齐名。”“孺子”，《宋书·谢裕传》作“稚”，《南史》避唐高宗小名而称其字“孺子”。《宋书·谢庄传》：“（庄）泰始二年卒，时年四十六。”据此上推，庄当生于永初二年(421)。庄为稚族兄，是稚必生于谢庄之后。又《南史·谢孺子传》：“（孺子）为新安王主簿，出为庐江郡。辞。宋孝武帝谓有司曰：‘谢孺子不可屈为小郡。’乃以为司徒主簿。”由此可知，《历代名画记》所云稚“初为晋司徒主簿”，应为“宋司徒主簿”。

④ 刘义庆：《世说新语·巧艺第二十一》第十三条。

⑤ 参阅俞剑华、罗未子、温肇桐编著《顾恺之研究资料》，人民美术出版社1962年3月第1版（下引此书，版本均同）。

艺术家戴逵不仅“善图贤圣，百工所范”^①，而且同他的儿子戴颙还特别擅长雕塑，创作了许多雕塑艺术精品。《高僧传·释慧力传》^②载：东晋建康（今南京）瓦官寺^③有戴逵“所制五像，及戴颙所治丈六金像”。戴逵雕制的佛像同顾恺之画的维摩诘像壁画以及师子国所献的四尺二寸玉佛，被时人“谓为三绝”。^④

在东晋，爱好音乐成了一种风尚。见于记载的，诸如王廙、王敦、王羲之、王徽之、王献之、纪瞻、贺循、谢鲲、谢尚、谢安、桓伊、戴逵、戴勃、戴颙、羊昙、袁山松、张湛和陶渊明等，都特别爱好音乐。他们当中，有不少人分别在不同方面、不同层次上作出了贡献。谢鲲、桓伊、羊昙、袁山松和张湛等以声乐著称。其中“羊昙善唱乐，桓伊能挽歌，及山松《行路难》继之，时人谓之‘三绝’”^⑤。弹琴在东晋的文人中，相当普泛。王羲之、王徽之、王献之、谢鲲、谢安、戴逵、戴勃、戴颙和陶渊明等，在琴艺方面都有相当高的造诣。此外，王敦能击鼓，谢尚善抚箏，桓伊能吹笛。上述事实说明，东晋在音乐领域里，也取得了重要的成就。

以上我们概略地评述了东晋在书法、文学、绘画、雕塑和音乐等艺术中所取得的成就，有些特别列举了作品的数量和质量情况，虽然不很全面，但综合起来，可以看到，东晋的文艺作品数量多，而且是有质量的多数量，东晋确是一个文艺十分繁荣的朝代。

二、多元共荣·创新·主观内容的增强

百多年的东晋文艺是相对稳定、相对独立的文艺。东晋文艺的繁荣是众多文艺家共同努力的结果。虽然东晋的艺术家的经历和学养不同，在文艺上都有自己的独特性，但是他们大体上是在共同的历史条件下生活的，不少人有相近的

① 谢赫：《古画品录》，见于安澜编《画品丛书》，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82年3月第1版（下引此书，版本均同）。

② 释慧皎撰：《高僧传》，汤用彤校注，汤一玄整理，中华书局1992年10月第1版（下引此书，版本均同）。

③ 瓦官寺为东晋建康著名之寺。“官”，《历代名画记》卷五、宋张敦颐撰《六朝事迹编类》卷十一“升元寺”条均作“棺”，误。《建康实录》卷八引南朝宋代沙门释县宗所著《京师寺记》（《高僧传》卷十三《释县宗传》作《京师塔寺记》），《高僧传》卷一《安清传》、卷五《竺法汰传》、卷十三《释慧璩传》和《释县宗传》均作“官”，是。参阅张忱石点校《六朝事迹编类》校勘记，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1月第1版，第118页。

④ 参阅《梁书·海南诸国传》，中华书局1973年5月第1版（下引此书，版本均同）。

⑤ 《晋书·袁山松传》，中华书局1974年11月第1版（下引此书，版本均同）。